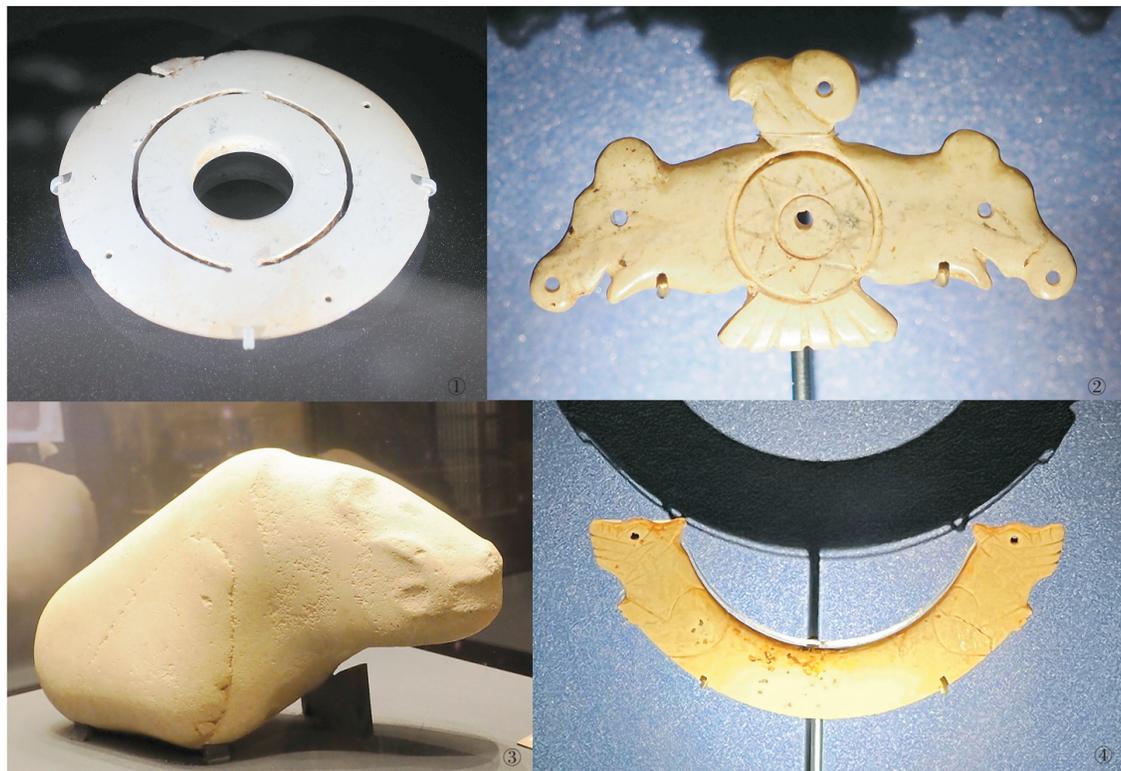


故宫博物院举办凌家滩玉器大展

# 折射五千年前璀璨文明

本报记者 邹雅婷



庄严肃穆的玉人，暗含丰富哲学思想的刻图玉版，反映新石器时代自然崇拜的玉龟、玉鹰……近日，“文明先锋——凌家滩文化玉器展”在故宫博物院文华殿开幕，为观众奉上一场史前玉文化盛宴。

凌家滩遗址位于安徽省马鞍山市含山县，距今约5800年至5300年，是长江下游同时期面积最大、保存最完整的聚落遗址，自1985年发现以来，出土大批重要玉器，与红山文化、良渚文化并称“史前三大玉文化中心”。

此次展览由故宫博物院、安徽省文化和旅游厅（安徽省文物局）、马鞍山市人民政府主办，安徽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安徽博物院、含山县人民政府、含山县凌家滩遗址管理处、含山博物馆联合承办，汇集5家考古文博机构的399件（套）重要文物，体现了历年及最新考古成果。展览分为“问天究源”“斧钺圣权”“邃古炊烟”“神巫王权”“天工巧艺”“九州共辉”6个单元，生动展示了中华五千多年文明史中璀璨的“凌家滩篇章”。

## 反映先民信仰

凌家滩遗址是中华文明“古国时代”第一阶段标志性遗址之一。考古学家严文明曾指出：“在长江下游，凌家滩人是首先走上文明化道路的先锋队。”故宫博物院器物部研究馆员、策展人徐琳告诉记者，展览主题“文明先锋”正是来源于此。故宫博物院收藏了凌家滩遗址出土的玉器104件。此次展览是凌家滩遗址历年出土玉器第一次合璧展出，很多珍贵文物首次与观众见面。“我们动用了很强的科技力量，对参展文物进行检测、研究，有不少新的发现。”徐琳说。

凌家滩遗址是一处以“祭祀”为主要功能的中心聚落遗址，发现了奇特的祭坛、神秘的燎祭遗迹等，出土文物中有许多与祭祀、占卜相关，反映了先民的原始信仰。

凌家滩遗址共出土6件完整的玉人，3件为立姿，3件为坐姿，此次展出其中4件。玉人皆为方脸，以阴线刻出“介”字形方格纹冠，两耳垂处各有一圆形穿孔，以示穿戴耳饰之用，腰间雕出斜纹带饰。除姿势不同外，6件玉人的差异在于腕部阴刻的手镯数量不同，分别有5个、6个、7个。它们背后都有斜向对钻的穿孔，可穿缀在特定载体上作



为祭祀礼器使用。孔径仅1.5毫米左右，表明当时的钻孔技术已达到令人惊叹的程度。玉人服饰精美，表情庄重，双臂贴胸，十指分开，似为礼神致敬之姿，可能表现了凌家滩高等级贵族中巫师的形象。

玉鹰是凌家滩文化最具代表性的器物之一。鹰侧首微视，双翅张开，翅端各为一猪首形象，可能以猪作为财富的象征。鹰腹刻八角星纹，这种纹样在凌家滩出土的玉版和新石器时代众多陶器上都有出现。这件玉鹰可能是举行祭祀仪式时所用之物，鹰、猪、八角星纹集于一器，体现了先民崇尚万物有灵的宇宙观。

在玉鹰两边，展示着玉龙和神树形玉饰。“凌家滩16号墓出土的这件玉龙，是迄今发现最早的有角有鳞的玉龙。”徐琳介绍。玉龙呈首尾相衔的环状，龙首吻部凸出，头顶伸出两角，耳、嘴、鼻、眼以阴线刻出。龙身外缘刻一周17条斜线，象征龙鳞。龙身近尾部有一钻孔，应是系挂或连接所用。

神树形玉饰呈等腰三角形，扁平片状，底边对钻4个圆孔。正面正中有一条阴刻竖线，两侧有18组对称阴刻斜线分布，整体呈树形。据介绍，这件玉器上的纹饰与安徽蚌埠新石器时代双墩遗址发现的刻划树形符号以及安徽淮北汉代画像石中的“神树”图案十分相似。

独立展柜中展示的一组玉龟、玉版、玉签格外引人注目。它们均为故宫博物院所藏，1987年出土于凌家滩4号墓。玉龟由背甲和腹甲组合而成，两片玉甲上的小孔正好相对，可用绳穿入，组成一副完整的玉龟甲。玉版出土时夹在玉龟的背甲、腹甲之间，位于墓主的腰部，旁边还有一根玉签，三者可能组合使用。玉版略呈长方形，正面略凸，反面稍内凹，两面均抛光。玉版四周有23个小穿孔，正面刻纹，中心圆内为八角星纹，大小圆之间以直线均分为8个区域，每个区域内各有一条圭状纹，分别指向八方，呈放射状。大圆外有4条圭状纹指向四角。

八角星纹是世界范围内常见的一种图符，最早出现在七八千年前，在古代中国、美索不达米亚、印度、欧洲等地均广泛分布。新石器时代大汶口文化陶器上的八角星纹，与凌家滩玉版上的八角星纹轮廓一样，只是少了中间的连线。关于玉版图案的涵义，学界说法不一：有人认为是太阳或天地之神的象征，或是远古的洛书和原始的八卦，可能反映了“八方”和“数理关系”概念；还有学者认为它反映了古代历法，是史前的日晷图像，或是记录了超新星爆发的天文现象。

## 展现社会面貌

5300多年前的凌家滩，气候温润、物产丰富、水运便利，先民们在此耕田养猪、打猎捕鱼、烧陶冶玉、纺织织布，形成了繁荣的聚落。展厅里陈列着凌家滩遗址出土的陶罐、陶杯、陶纺轮、猪骨、鱼脊椎骨等，勾勒出当时的生产生活面貌。

凌家滩已经出现了明晰的社会分工和阶层分化，围绕祭坛而建的70座墓葬分属于不同阶层——掌握神权的巫师、制作玉器的工匠和平民。不同身份的人埋葬区域不同，葬制葬仪也有较大差异，随葬品有丰有寡。

2007年发掘的23号墓规模之大、随葬品之多，为凌家滩墓葬之最，专家推测墓主人具备“巫”与“王”的双重身份。棺内底部铺满石铈、石凿，墓主面部覆盖1件绿玉铈，腰部系挂3组玉龟形器，手臂两侧放置对称的两组石铈，头脚两端均有1件玉璧和多件环、镯，棺内还散落玉珠、玉环等饰品。棺外随葬豆、鬲、壶、盆等陶器和石铈、石铈等。重达88千克的玉石猪压在墓口之上。

此次展览以多媒体形式介绍了这座“王者之墓”的形制和随葬品，并展示了墓中出土的重要文物。玉石猪是目前国内考古发现的同时代最大、最重的玉雕作品。猪拱部凸出，其上有两个鼻孔，嘴两侧

刻上弯的獠牙，应为野猪形态。眼和竖耳用减地法表现，颈部宽而浅，腹部一侧刻两条弯曲的线，象征蜿蜒的双腿。这件大玉猪发现于墓口上方而不是墓底，可能有某种指示或镇墓功能。

在“天工巧艺”单元，琳琅满目的艺术品体现了凌家滩工匠先进的治玉工艺。兔形玉梳背表面琢磨光滑，上部雕琢兔首，可爱灵动，下部为带有4个圆孔的长条形凹边，推测为梳子的组合件——梳背。

双虎首玉璜两端雕出虎首形，阴刻出鼻、嘴，以两面管钻孔为眼，面部浅浮雕耳、吻部，前肢收于身前呈伏卧状，以阴刻线纹表现虎斑纹理。这件虎头璜造型独特，形象逼真，萌态可掬。

水晶耳珥表面琢磨光滑，抛光的净面度很高，其球面体在显微镜下放大120倍观察仍不见磨痕，可与现代抛光技术媲美。

## 见证文化交流

距今5000多年是中华文明形成的关键时期。九州大地上，庙底沟文化、红山文化、凌家滩文化、良渚文化、屈家岭文化等熠熠闪耀，如同繁星满天，它们各自蓬勃发展，彼此之间又有交流互鉴。展览最后一个单元“九州共辉”阐释了凌家滩文化与红山文化、良渚文化的联系，并展示了故宫博物院收藏的新石器时代多种典型玉器。

西辽河流域是中华文明的重要发祥地之一，距今6500年—5000年，这里孕育出灿烂的红山文化。红山文化晚期先民与凌家滩先民一样尊玉崇神，制作大量精美的玉礼器和玉饰。

红山文化玉玦形龙与凌家滩玉龙都呈头尾卷曲状，吻部凸出，且都有穿孔，可随身佩戴。这类玉玦形龙在红山文化中很常见，有学者认为其首部似猪，称之为玉猪龙。玉斜口筒形器也是红山文化的代表性器物之一，因其形似马蹄，又被称为马蹄形器。辽宁牛河梁红山文化遗址中出土多件斜口筒形器，有的放置于人头骨上下，有的位于胸腹间或右肩部。“关于它们的用途有多种说法，如发饰、工具等。”徐琳说，“凌家滩23号墓出土3件玉龟形器后，不少专家认为，红山文化玉斜口筒形器的造型和功能可能受到凌家滩玉龟形器影响，是祭祀或敬神仪式中占卜的法器。”

距今5300年—4300年，长江下游太湖流域出现了良渚文化。良渚与凌家滩地理位置相近，年代接续，在玉器工艺、形制和聚落营建、布局等方面表现出千丝万缕的联系。

凌家滩遗址出土的玉人头雕像，头戴三瓣叶式冠，额上有3道凸棱，额中部向上略隆起，其下似鼻梁，两眼残存一半，呈椭圆形上挑，与良渚玉器中的神人像颇为相似。

在凌家滩文化、红山文化、良渚文化中都发现了“介”字形玉冠饰，充分证明三大玉文化之间存在密切交流。

展览结尾处展示了一件凌家滩文化重环玉璧，与之对照展出的是故宫博物院收藏的2022年北京冬奥会金牌。徐琳介绍，北京冬奥会奖牌设计灵感之一来自凌家滩重环玉璧。一枚枚闪亮的奖牌，承载着凌家滩先民的智慧，将源远流长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推向世界。

图①：凌家滩文化重环玉璧。 杜建坡摄  
图②：凌家滩文化玉鹰。 杜建坡摄  
图③：凌家滩文化玉石猪。 杜建坡摄  
图④：凌家滩文化双虎首玉璜。 邹雅婷摄  
图⑤：凌家滩文化坐姿玉人。 杜建坡摄



安徽省桐城市六尺巷近景。 江胜摄（人民图片）

安徽桐城，文脉深厚。这里孕育出了彪炳文坛的“桐城派”，也保留着六尺巷等承载中华传统美德的文化遗产。

六尺巷故事的主人公张英是清代名臣，历任工部尚书、礼部尚书、文华殿大学士等职，康熙曾称赞他“始终敬慎，有古大臣风”。张英重视家庭教育，其撰写的家训《聪训斋语》流传甚广。张英的几个儿子受到良好家风熏陶，都颇有成就，次子张廷玉历仕康熙乾隆三朝，是清代唯一配享太庙的文臣。

在《聪训斋语》中，张英记载了许多人生思考。张英认为，人心易动摇，缺乏坚定心志的人很容易在生活的漩涡中迷失。正如罗盘上的磁铁能使针指向特定方向，书籍是“养心第一妙物”。好书能帮助人们放下杂念，找到目标，并从容看待“人间拂意之事”。张英喜欢阅读苏轼、陆游等先贤著作。他说，读苏、陆的作品，就像与君子相对而坐，能近距离学习前辈们的气度风范，实在是人间快事。

张英性情宽厚，友善仁爱，强调“与人相交，一言一事皆须有益于入”。父亲张秉彝对他影响很深。张英谈到，他侍奉父亲30年，从未见过父亲疾言厉色的样子，而且父亲做了好事常常不让人知道。

张英认为，人生在世应以和为贵，在把握原则的基础上，若能尽量站在他人角度思考问题，则有利于消除误会隔阂。结合自己在刑部的工作经历，他感慨道：“见天下大讼大狱，多从极小事起……每思天下事，受得小气，则不至于受大气；吃得小亏，则不至于吃大亏。”张英告诫家人，凡事都不要占便宜，“便宜者，天下人之所共争也，我一人据之，则怨萃于我矣；我失便宜，则众怨消矣。”对待邻里，他的态度是“居乡则厚重谦和，足以取重于邻里”“无争于人，无愧于己”。

据晚清学者姚永朴《旧闻随笔》记载，康熙年间，张英在京城为官，老家的亲人给他写信，请他出面解决张家与吴姓邻居的宅基纠纷。张家宅邸旁有一块空地，吴家扩建院落想要占用此地，两家争执不下。张英收到家书，写了一首诗寄回去：“一纸书来只为墙，让他三尺又何妨。长城万里今犹在，不见当年秦始皇。”家人收到信后，主动让出三尺宅基；吴氏深受感动，也退让三尺，两家之间于是形成了一条六尺宽的巷子。这条六尺巷，是张英以宽厚谦让的胸怀妥善处理邻里矛盾留下的珍贵历史遗存，如今，仍吸引着中外游人前来感受“礼让”之风。张英的这种处世态度深深影响后人。其子张廷玉在家训《澄怀园语》中写“天下之道，宽则能容”，正是对张英思想的继承。

作为康熙时期重臣，张英一直廉洁自律，他尝言：“使我为州县官，决不用官银媚上官，安知用官银之祸，不甚于上官之失权也。”在生活中，他也崇尚节俭，将“俭用”作为安身立命的四大原则之一。在节俭的同时，张英鼓励子孙用省下的钱财帮助他人，这样会使金钱更有价值。在《聪训斋语》中，他写道：“予意欲归里时，仿陆梭山居家之法：以一岁之费，分为十二股，一月用一分……月晦之日，则总一月之所余，别作一封，以应贫寒之急。”张英模仿南宋学者陆九韶的方法，将一年的家庭开支分为12份，如果月末产生节余就存起来，日后可用这笔钱帮助贫寒之人。他说，如果能因此多做一两件好事，比每天享用丰盛食物的乐趣要强得多。

张英过60岁生日时，按照当地习俗，本应请邻人看戏。但他认为，请人看戏“徒有应酬之劳，而无耐适之趣，不若以其费济困顿”，便用这笔钱制成棉衣裤百件，“以施道路饥寒之人”。

张英注重身心健康，喜爱亲近自然，保持“和悦”的精神状态。他写道：“人生不能无所适以寄其意。予无嗜好，惟酷好看山种树。”张英最爱攀登故乡的龙眼山，曾用深情的笔调描述龙眼山四时之美。他还引用陆游诗句表达看山的乐趣永不厌倦，“游山如读书，浅深在所得”，每爬一次山，他都能有所收获。

张英的《聪训斋语》融读书之道、修身之道、齐家之道、养生之道于一体，不仅富有哲理，且实践性强，对后世影响深远。清代名臣曾国藩曾感叹道：“（此书）句句皆吾肺腑所欲言。”

（作者为四川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

## 伊朗文物精华展亮相新疆



近日，“古波斯的荣耀——伊朗文物精华展”在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博物馆开幕。展览共分为“高原曙光”“辉煌时代”“信仰艺术”3个版块，共展出216件文物。其中诸多展品不乏中国元素，展现了古波斯文明与中华文明的交流融合。图为参观者在展览现场拍摄三狮足青铜烛台。 新华社记者 陈 朔摄